

论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多向性

——兼评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发展线索

罗伟涛

(株洲工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0)

[作者简介] 罗伟涛(1965—), 男(汉), 湖南攸县人, 株洲工学院讲师。

[摘要] 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线索是多向的, 但传统观点认为, 从康德到费尔巴哈是一以贯之的、逻辑的。产生这一观点的原因是把这个时期的哲学发展看成是理性哲学发展的过程。然而, 这一观点不仅不能解释谢林哲学的非理性特征, 而且把本来多向发展的德国古典哲学简单化, 且无法解释现代哲学的多元性, 无法说明非理性哲学的产生。重新梳理德国 19 世纪哲学的发展线索, 关注德国哲学发展的多向性以及现代哲学的深远影响, 无疑是对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一种新认识。

[关键词] 德国哲学; 发展线索; 多向性; 理性; 非理性

我们习惯上把康德至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段时期的哲学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 认为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是理性哲学发展的过程。我认为, 德国哲学发展的线索应该是多向的, 这不仅可以从德国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哲学上看出精神发展的多方位, 而且现代的非理性思潮也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在德国哲学中寻找精神来源的问题。黑格尔的哲学圆圈——在哲学史上表现为几大哲学系统——的思想只能给我们提示“理性哲学”的轨迹, 即绝对理念的不同环节和达到对自我的意识, 而那不以“反思”作为哲学活动的出发点, 只追求意志实现的非理性之路似乎难以在这圆圈中显

现。思辨精神把理性抬到了至高点, 而自由的激情则把人引入非理性的王国。理性似乎在排开了宗教的庇护和法律的尊严之后, 以自身的判断决定一切, 然而自由问题和人性又不能在理性的逻辑中解决。理性和非理性看似矛盾的, 但是它们又构成了哲学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哲学即理性和哲学即诗同时成为德国哲学的标志。本文以这两大线索对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多向性进行探寻, 冀望从中发现哲学的真正意蕴。

一、康德是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开创者

康德的哲学以它特有的精神——人的主体性原则而开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先河。康德哲学的

主体性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自我意识理论和《实用人类学》中对“人是什么”问题的探讨。

在《纯粹理性批判》一文中,康德对自我意识进行了规定。康德的自我意识表现为一种主动的概念性的自我理解,或称之为“自我反思”。自我意识是统一的,它先天就具有综合统一的功能。自我意识不是无我,而是概念性的意识,即不是非理性的意志,而是理性的意识。理性的意识能把众多表象统一起来,它本身是主体,具有某种活动性的功能,它超越时间,总是使自我保持连续性和持续性。但是“自我”并不是直观地、情感地意识到的,它必须经过“反思”,我必须从外界世界中移开,转向自身以便产生对自我的意识的要求。自我意识具有能动性,即意识对它进行意识时,总是处于联系之中,正如思维意味着判断,把主谓语联在一起。联系活动就表明主体处于一种活动之中,意即能动性。而面向意识的材料,总是无规章,杂乱不一的,所以,为获得统一性的客观知识即经验和科学,就必须以主体自身的综合功能为前提。把意识描述为主动的原则,这是康德哲学的根本点。没有主动性,就不能对对象自由立法。有了主动性,自由的概念才被解释为“自我规定”。自由在行为中总是自己为自己创造规则,自我的立法成为最高的立法。自由虽是有规则的自由,但规则在自由之中,它体现了自由的创造性。不过这创造是反思型的,自我没有设置自己,而是肯定预先给定的“反思”是发现自我,肯定自我,而不是创造自我。自我是本体,如同笛卡尔一样,它只是创造它物,而不是被它物创造。因此思维在这里没有否定性。反思的我去认识我时,先以我在为肯定条件。康德旨在说明自我意识的功能,却在反思我中又以自我意识为前提。“反思”型的自我意识是循环论证,它又为黑格尔所继承。

康德开创了意识的自动性和自由原则,是以后德国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从此对意识的分析成为哲学的形而上学课题。费希特把自我意识上升为创造性的本体,谢林对它的分析使它进入非理性王国,而黑格尔除掉了意识的形式功能(这点在康德那里是主要的),使意识成为质料,即意识不仅是形式的,同时又是质料的。意识通过辩证运动(在费希特那里是主要的)而使它上升为绝对。叔本华把自我认定为意志,认为意志的盲目冲动才是创造世界的源泉。布伦坦诺、胡塞尔、海德格

尔对意识的先定分析是以意识的自动性和意向性为原则的。对主体意识的分析,成为这时期德国哲学的目标。

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则突出了对人的精神的分析。尽管康德在人类学方面曾试图用先验原理加以说明,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实用人类学》并不是“先验人类学”,因此关于人的精神的分析就仅限于现象的人类学,即从人的历史方面加以分析。康德认为人类一切知识的运用对象是人,人是人的最终目的。人必须是以创造者的身份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必须从人的历史中寻找,或者说必须对历史进行理性批判。康德一生都在追问这问题,实际上他很难给出一定的答案。因为当他追问人的本质时,他把现象的分析投入进去,或者说关于人的历史现象是可以分析的,而人本身是什么的问题,毋宁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是不可知的。因此在《实用人类学》中,我们寻找不出康德真正关于人的分析,而康德头脑中的隐含部分——先验人类学只是折射在《实用人类学》之中,这就是作为创造性的人的自由问题是如何可能的。我们可以看出,批判哲学中牵涉到的自由问题实质上成为了人的问题的分析。把自由作为人的根本标志正是康德最终要说明的问题。

康德哲学作为开创性哲学包含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也为后来的哲学留下了诸多发展的空间。德国哲学通过对精神成分的分析,对理性和非理性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从而构成了这一时期德国哲学发展的多向性。

二、从费希特经谢林到黑格尔——理性哲学的发展线索

黑格尔认为费希特把康德哲学加以系统化。事实上,费希特也称自己的哲学不过是康德哲学的发挥而已。但是费希特哲学与康德哲学有很大的差别。在自我意识的自由和综合功能上,费希特与康德的观点相同,但是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是创造性的“自我意识”,与其说它是思维,还不如说它是行动。自我能设定自我,创造非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自我并不是经过反思的环节达到对自己的意识,而是一个创造自身的过程。由此自我具有绝对的创造功能。费希特消除了康德的物自体的概念,把思维上升到无限。他一方面坚守理性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又赋予自我非理性的新的规定,从而给自我注入了深刻的活力。

费希特发扬了康德强调人的主体性的精神，但康德的自我是反思的自我，而费希特的自我则更多强调非理性的冲动，它能创造一切。

谢林一方面沿着费希特开辟的“自我决定一切”的道路前进，另一方面由于他研究自然和艺术的气质而具有泛神论倾向：认为自然是潜在的精神体。他认为费希特的自我不具有绝对确定性和普遍性。首先，费希特的自我实质上是一个经验的自我，它并没有达到自我与非我的完全统一；其次，费希特虽然发扬了主观性，但没有与实体结合，没有达到主体即客体，不是主体构造成客体，而是主体就是客体。

谢林认为，自然与理智是统一的，它们相互包含的原因就是那“无差别的绝对”。对于“绝对”来说，一切非“绝对”的都是有限的。差别是有限的表现，“绝对”就应该是无差别、圆满，实质上就是“上帝”。在谢林那里，我们看不到那无限“绝对”是经过怎样的环节过渡到有限的“自我”和“自然”的，正如在斯宾诺莎那里我们看不到唯一的实体是怎样产生广延和思维的东西一样。正是在这一点上，理性哲学开始向非理性哲学过渡。黑格尔站在理性哲学的立场上高举理性的大旗批判谢林的非理性成分，把理性推到了绝对。

黑格尔哲学是这一时期理性哲学的最高峰。“理性”从获得自我意识到获得实体性，最后上升到“绝对理念”。“自我意识”成为主体，这是主体性哲学的继续发扬；同时“自我意识”成为真实的理念，成为实体，这是斯宾诺莎实体的理念化。黑格尔认为，费希特的“自我”终究是一个主观性的自我，受一个对立面牵制，从而缺乏“自由”的活动。黑格尔认为，谢林虽使主体和客体同一，但是他的“绝对同一”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这好比在黑夜中观牛，其中皆黑一样，消除了差别性，思维就是一个空洞的无底深渊。在此我们看到黑格尔用理性的辩证法精神批判谢林把思维与存在划归为一的思想，它根源于两者对哲学体认的不同观点。

黑格尔把实体与主体统一起来，成为一种“绝对精神”，表现这种精神的本质就是逻辑学。逻辑是精神纯演绎的科学，它通过概念来表现自己。概念的演绎是辩证的，精神就是在这种辩证活动中认识自身。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维活动的形式，是一种“反思”的理性。思维在对自身的认识中达到目的。康德把真理放在思维的综合功能

上，而黑格尔把真理放在思维的辩证运动中。因此思维是理性演绎的，即真理是在“反思”中达到，而不是在创造中体认。这与费希特“自我设定、创造自我”不一样。“反思”理性是与实践理性有着根本差别的。“没有主体实践，是体认不到真理的”，这是非理性哲学的根本，而理性哲学的教条是“没有反思就不存在真理”，这两种精神实质上是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变种。事实上，“反思”理性遇到的最大矛盾是：自我要认识它自己，必以反思作为环节，而反思活动是以反思者为前提的，反思者就是自我。所以要认识的对象成为认识活动的前提。黑格尔虽嘲笑了康德，实质上他只不过玩了一次狡计，把理性变为绝对理念而已。

从康德至黑格尔哲学，对主体性精神中理性的反思精神、自由精神作了深刻的论述，是这一时期主体性哲学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正统哲学的代表。在高扬理性精神的时代，哲学家们对理性的精辟论述，使人的精神在脱离神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从费希特经谢林到诗化哲学——非理性哲学发展线索之一

费希特哲学中的“自我”不仅是理性哲学家中的思维的主体，而且是一种“意志”，“意志”的特点是满足。而“非我”仅是“意志”满足自身的工具。因此费希特所设定的“三命题”从表象上看似乎是某种“正反合”的逻辑，而从真正的意义上看，则为“意志”的历程。“意志”的特点是“创造”，没有“创造”，“意志”是无法满足自己的。在创造活动中，意志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这种纯粹的力量就是费希特的“自我”。费希特认为，“自我”就是活动本身，它是积极的、能动的、永恒的。“自我”按照它的要求按照它的“逻辑”去行动、去创造，没有什么成为它的指令。“自我”虽受“非我”的限制，然而这是出于“自我”的，同时“自我”又有能力超越它。创造性的自我，其目的是在活动中实现自己，丰富自己；而反思性的自我，其目的是在认知中理解自己，完成自己。由此我们看到理性与非理性在本体论上的差别。

费希特在发扬人的主体性方面，把哲学从求知领域移到实践领域。他说过：“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这就是你的使命”，我一全神贯注片刻，注意我自己，这声音便在我灵魂深处强烈回响起来，你在这里生存，不是为对你自己作无聊的冥想，或为了对虔诚感作深刻的思考——

不 你在这里生存 是为了行动, 你的行动 也只有你的行动 才决定你的价值。”^[1] (P78—79) 费希特注重实践理性 是向往人能在实践中 达到“绝对自由”。没有他物的限制, 人仅以自己的意愿行动, 此时理性才真正成为自由。不过, 费希特把实践理性变成人的爱的呓语, 实践理性就是道德实践, 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理性体验。在谢林那里, 非理性的直观和体验才真正成为非理性精神的实践活动。

谢林的哲学精神在于德国由来已久的泛神论和新起的浪漫精神。谢林说: “我坚信 哲学家必须像诗人那样具有更多的审美力量。精神的哲学就是审美的哲学……。”^[2] (P189) 哲学所向往的目的即对无限绝对的认识由艺术加以完成, 因此艺术对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 因为艺术好像给哲学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 在永恒原始统一中, 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与思维里躲避的东西都燃烧成了一道火焰。哲学必须从诗中诞生, 从诗中得到滋养, 最后又如百川归海一样回到诗的大海中。艺术使我与非我同一、认识与实践同一、意识与无意识同一、精神与自然同一、有限与无限同一, 艺术就是一种于最平凡的事实中表现那最深透的人生意义的东西。艺术家的冲动正是自由行动中有意识的和无意识事物之间的矛盾, 同样, 能满足我们无穷渴望和解决关于我们生死存亡的矛盾的也是艺术。没有对无限永恒的爱, 是不能达到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哲学都是以精神与自然的绝对统一为基础, 为最高境界。所以这两种科学实为一种, 即诗化哲学。在此诗变为哲学, 哲学被诗化, 从而哲学抛弃了反思的概念而进入更高和更深的非理性直观中。黑格尔认为这是谢林放弃了概念的严肃性和思想的清醒性而代之以无聊的幻想, 并把这些无聊的幻想当作深刻的直觉, 高远的预见, 并当作美的诗。费尔巴哈则认为, 黑格尔将非理性化为理性, 而谢林将理性化为非理性。其实用诗去给哲学套外衣, 并不是用幻想代替反思, 而是在反思中寻找更加普遍和绝对确实性的东西。只有把哲学加以诗化, 那反思的理念才达到绝对同一, 同时体会到真正的哲学是关乎人生的。

从费希特到谢林哲学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人的主观性中非理性因素得到了发扬。主体即是实体, 即是意志。它遵循思维发展的逻辑, 同时又极力从中获得任意妄为的自由。反映在每

一个个体上, 它表现为人生的矛盾: 人总是以反思的精神去达到无限, 超越“此在”(人当下的场合), 但有限的个体无论如何是不能达到无限的。思维具有至上性和无限性, 但它又是有限的。那无法理解和认知的物自体事实上就是人生的理想。只有逃到艺术和宗教的王国中, 把它作为体验的对象, 人才能在直接观照中与无限融合。在此, 谢林把哲学诗化, 为浪漫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浪漫哲学是浪漫主义的产物。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又体现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以至更后期的文化活动中, 在德国却构成了一种思想传统。德国民族的精神中, 思辨和浪漫是两大精神倾向, 或者说最思辨的也就是最浪漫的。这两者的统一构成了德国哲学以至全部文化的特色, 使德国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內容。“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运动”^[3] (P723)。“从 18 世纪后期到今天, 艺术、文学和哲学, 甚至于政治都受到了广义上所谓的浪漫主义运动特有的一种情感方式积极或消极的影响。”^[4] (P213)

浪漫主义所强调的自由和情感、移情和超越成为德国哲学家们的精神气质。费希特强调主观的“自我”为绝对的本体, 谢林直接认艺术哲学为最高的哲学, 施莱尔巴赫则把直觉、情感作为哲学根据进行构造, 而诗人哲学家们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蒂克充满激情地追求诗化的世界。康德虽把理性抬到立法者的地位, 同时又给它制造了范围。康德强调想象力的重要, 其目的是认为只有想象力才能追求那物自体。甚至连黑格尔这样的理性主义者, 当他把绝对理念抬到至上的地位时, 我们可以认为他这是一种浪漫的情调。

浪漫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诗人哲学家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施莱格尔说: “没有诗, 就没有实在”。诗的世界是一个与现实的庸俗的世界对立的世界。施莱格尔认为浪漫诗是渐进的包罗万象的诗。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包括在诗中, 它成为总体艺术、总体哲学。只有诗是无限的, 就像只有诗是唯一自由的一样。诗与人生是合一的, 在诗的世界里, 一切有限的东西都无以存在, 人生才得到真正的解放, 即获得自由。

诺瓦利斯认为, 人的全部生存如果只建立在纯粹理性之上, 那几乎不可思议。人的内心有比理性更高的要求, 情感是人全部赖以生存的基础, 人必须用灵性去感受世界。他认为, 科学的精神把事物硬性分裂, 它无法融入事物的内心, 科学毁

灭了人的内在灵性。理性主义使世界浸润在冰水之中。诺瓦利斯认为,只有研究诗,将所有科学诗化,才能改造人类自身。诗实在是人对自身的超越。诺瓦利斯认为,精神产生于自然,并存在于自然之中,但是自然又窒息着精神,它是一种魔化了的精神。人面对自然,唯一的解魔法是诗。诗具有魔力,在观照自然中,自然中的精神才体现出来。诗的世界就是自然与精神的合一状态,诗人能在有限中见出无限,自然中见出精神,客体中见出主体。由此诗变为一种哲学。

诗人哲学家们不像理性哲学家有一套固定的体系(谢林也可以说无体系),但他们却有一种共同的倾向:以情感和诗为实在,以美的体验作为超越当下存在的途径。他们心目中的诗已不是诗学,而是哲学。它作为解决人生最根本矛盾的方式,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他们的诗化哲学都从费希特哲学出发,宣扬主观性,强调创造性以及以有限和无限的同一作为最高境界,因此非理性主义精神真正诞生了。

四、从康德到叔本华——非理性哲学发展线索之二

康德哲学强调知性的立法者地位,但它又被划定了范围,知性是无法克服自己的有限性而达到无限的本体的。物自体就成为知性的悬设目标,可望而不可及。康德把物自体纳入到实践理性中,实际上物自体就成为道德设定的根据,即内心直观的对象。

叔本华从康德哲学出发。他认为康德区分了物自体和现象界,道德与认识,这是他的功绩,但是他又割裂这两者,因而他的哲学仍然是一种实在主义(强调理性逻辑)。叔本华认为,人的生存先于人的认识。人生存,就必须感受。他感受到自身中一股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即意志,这种意志就是物自体。叔本华认为,传统认识论以主客体统一、矛盾作为最高的哲学问题,由此推演的哲学系统一定受根据律的支配,而受根据律支配的东西必在现象界内。传统哲学以主客同一为本体,而这实际上是一种现象。在主客体关系中,是永远触不到自在之物的。

叔本华认为,世界就是我的表象,世界就是我的意志。前者是说世界只是作为我的表象而存在,因此这世界的一切就不是本真的,它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这世界亦是人生世界。由于人生世界受意志支配,又无法认识到意志,因此总是让

人处于痛苦和无聊之中。生存就是有罪。同时世界又是我的意志,世界只是意志的客体化。在客体化中,有一系列等级,人处于最高等级,需求更大,因而生命意志就在更大程度上折磨人。人生是悲观的。由于意志的无所不在,因此理性也受意志的支配,理性是意志的仆从。这反映了叔本华强烈的非理性色彩。

叔本华认为,在审美直观中,意志不再对人起作用。因为审美是无功利的(继承了康德),不受意志的干扰。但审美又是暂时的,无法从根本上消灭意志。人必须自杀或投入佛教之中,才能达到意志的消亡,从而解脱由于意志带来的一切苦痛。

叔本华首先把哲学本体从实在(存在)移入生命之中。本体不是实体,而是意志。而黑格尔则相反,认为本体不是意志,而是实体。黑格尔亦认为本体又是主体,此主体是具有理性能动活动的意识,因而与作为意志的本体完全不同。以本体作为意志,使认识论发生重大转换,即认识以体验人生为最高旨意。作为认识中介的反思概念被作为直接体认的领悟概念所代替,哲学精神就有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说诗人哲学家把诗哲学化,那么叔本华则使哲学成为生命本体论。

从康德到叔本华,体现了又一哲学思维进程:个体主观性中的意志得到了肯定,即强调意志作为哲学的本体。他与理性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完全对立着,但又在揭示主体性方面有着重大贡献的哲学家。尽管人们把叔本华只看作是19世纪初起作用的思想家,但却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五、理性的哲学和本体论的诗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诞生地,但它又是理性哲学的市场。苏格拉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口号后,哲学转入心灵的探讨,人的理性成为人本身的代语。柏拉图认为理性控制着欲望,使人具有高贵的德性,理性即人即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的沉思生活是达到了神的生活。斯多亚派更强调理性的宁静,认为在毫无欲望的理性生活中,人达到至高的善。中世纪哲学则更强调理性对欲望的胜利,但与此同时理性又成为信仰的奴仆,理性只有与信仰不发生冲突或为信仰服务时才有价值。文艺复兴把理性的价值大大抬高。在哲学领域里,培根强调知识的重要性,笛卡尔则以“我思故我在”开始他的

哲学。人的理性精神(经验论者也依靠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分,人的高贵和伟大就在于其具有理性。人的理性甚至能与神性相媲美,神性也只有理性中才得以完成。康德一方面赞美理性的立法者地位,另一方面也把理性划入一定范围中。费希特则以意识的我作为创造的原始。到黑格尔,认为理性不仅是一种主体性思维,而且是一种本体、实在。黑格尔认为理性不仅占据宇宙中,而且也占据意识里才达到最后的光明,意即人是一切的最高目的,万物都以人的理性为根据。由此西方理性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但是人本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在人的意识中,精神与肉体、思想与本能始终处于对立之中。每一个理性主义者,事实上都承认这种分裂。笛卡尔制造出两个实体:认识和广延,它们就像两个难以融合的世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公民”,“冲动”和“精神”统一于我们。近代哲学的主题实际上是解决这种分离状况的。人不能站在二元论立场上,或者向一边倒,而必须在精神与物质中寻找更深的统一体。

尽管在柏拉图、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哲学中提到感性认识这一要领,但大多指它具有不确定性,是一种模糊的认识,或者干脆叫意见。甚至在美学的创始人鲍姆嘉通的《美学》一书中,美的经验是感性经验,是一种低级的形式,理性认识才是高级的认识方式。德国哲学家中,大多数强调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美学的神秘体验,是一种高级的理智直观,而不是一种感性直观。

对感性经验加以肯定并把它提升为与概念并列层次上的是浪漫诗哲们。在德国浪漫派诗哲中,新渗透的泛神论思想取代了二元论。万物具有精神,它本身是神的作品。自然在它本身中包含了永恒性,从而现实得到提升。感性经验由于抓住了现实,不再是个别无普遍性的质料,因而也就抓住了居于此间的神性。把握了意义的感性认识比思想站得更高,它比那抽象现实的思维意义更丰富更深刻。感性能在丰富的个性中揭示一种

神秘性,而理性在此无能为力了。

感性强烈反对理性,是把理性归于18世纪的观念即分析的、衡量的、计算的、机械的理性思维。这种思维更是缺乏神秘性。理性并非我们之中的神性部分,人不能长久处于意识状态,他必须重新将自己投射到潜意识当中去,因为那里人的根是富有生气的。强调感性,进到非理性,是思想发展的必然阶段。以潜意识说为主,从而说明整个意识活动,使传统的理性观倒置过来,更是狂飚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的格调。潜意识说尽管在莱布尼茨那里初次提出,但只是作为意识的否定阶段而设的,而在浪漫诗哲中,它成为人身上最根本、更高的、更真实的元素。对人的理解由此出现了新的观点:人的称号与其根据认识不如根据创造力。生命置于精神之上,理性成为欲望的工具,这是整个浪漫哲学和非理性主义的旗帜。

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贯穿于德国这一时期的哲学中。理性哲学家和非理性哲学家都追求一种同一性,前者以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为目的,后者则以有限与无限的融合为宗旨。理性哲学家强调存在即本体,而非理性哲学家则强调生命即本体。尽管这两派相互对立,但都构成此时期德国哲学的主流,其中单一的线索并不构成此时期的全部哲学,亦不能说明德国哲学的意蕴。

哲学即理性和哲学即诗同时成为德国哲学的标志。在两大主题中,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哲学的意蕴:哲学就是人学。

[参考文献]

- [1] 费希特. 人的使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 谢林. 德国哲学: 第1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 [3]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 下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责任编辑 何正欣)